



西部大开发决策中为何没有提出GDP指标

2000年4月,在“十五”计划重点调研课题汇报会上,我代表国家计委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想法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同年6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几种方案都摆了出来,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为“10+2”,即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

治区。

考虑到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会议还确定,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予以照顾。

后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纳入了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范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海南省原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六个县和湖南省张家界市的一区

一县等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般都要提出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目标。但是在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却没有出现GDP指标,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GDP是用来衡量、监测经济活动的总量指标,在所有统计数据中最受瞩目,曾被许多经济学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GDP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统计的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产品,没有交易的产品是不算在GDP内的。同时,GDP统计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对非生产活动,如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发展的内容,也不能完全反映出来。而这些没有反映的内容,很多恰恰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GDP统计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成果,一般来说是按年度或季度计算。各级政府在任期内提高GDP水平,是否牺牲了长期利益,是否考虑了可持续发



2001年8月5日,建设中的青藏铁路。

展,则很难考量。在实际工作中,GDP还有着经济以外的含义,包括地区排队、政绩考核,等等。

当时,西部一些地区考虑到GDP的增长,谋划了一批加工业投资项目。国家计委收到各地报来的很多申请,希望国家加大这方面投资力度。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对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其加快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去国家一有大的政策出台,经济建设往往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又是圈地,又是上项目,热闹一阵子,弄不好就留下一个烂摊子。历史上几次有过这种现象,教训也很深刻,现在又露

出了这种苗头。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工业不能一哄而上,避免发生新一轮重复建设。

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实现西部大开发目标,需要我们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单纯追求GD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全面发展上来,对西部地区已经出现的大上加工工业项目的热潮应当降温。在规划指标的选择上,我们考虑,是否可以不提出GDP目标,以免各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可持续发展,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或上一些没有市场和竞争力的项目。

经过多方论证和认真测算,最终我们在“十五”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中提出了一个5年、10年和50年的战略安排。这个规划虽然没有对东西部在缩小GDP差距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但在更广阔、更全面的领域体现了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要求。

(摘自《瞭望》曾培炎/文)

一次调研掀开“浙江农村改革第一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广大群众对农村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1979年冬种时,长城公社狄家垞二队的群众自发在油菜地开始了包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在1980年的晚稻种植中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然而,该事件引起的争议很大,甚至有“队长被抓起来了”的传闻,导致全县的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

中共长兴县委对农村改革高度重视。1981年4月初,时任县委书记丁文荣用9天时间,在长城公社狄家垞二队等地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地,丁文荣都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问、到田间地头看生产现状等方式了解情况。通过调研,丁文荣认为,“统一经营,联产到劳”是最受群众欢迎,也是效果最好的方法。他总结出其有利于提高社员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等10个方面的益处。

4月15日,丁文荣向县委提交了《关于“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4月21日,县委向全县批转了该报告。4月22日,县委办公室以《狄家垞二队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情况》为题详

细介绍狄家垞二队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并上报中共嘉兴地委办公室和《浙江日报》。

5月28日,《浙江日报》头版以《联产到劳真灵》为题,刊载丁文荣的5篇下乡日记,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种领导方法是很可取的”。《浙江日报》的宣传和县委的不断教育,极大地推动了全县农村改革的进程。8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长兴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落实生产责任制》为题,肯定

了长兴县从狄家垞二队开始的“联产到劳”责任制。

《人民日报》在配发的短评中指出:“浙江省长兴县委书记丁文荣走出办公室,就落实生产责任制问题深入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用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统一县委的思想认识……正确的认识、恰当的方法,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人民日报》的报道不仅肯定了长兴县的农村改革,也使得浙江省的农村改革迅速铺开。长兴县狄家垞二队的农村改革也因此被称为“浙江农村改革第一幕”。(摘自《党史信息报》长史/文)

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十一日,是曾国藩60岁生日。这次生日,他出人意外地“高调”了一把。作为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其时正在上海巡阅水陆各营防务。在前一日公务应酬很晚后,曾国藩专门抽出时间与幕僚李勉林商量款客事宜,还开了个详细清单,直忙到生日那天凌晨3点才睡。

这天上午,到江南制造局曾国藩临时住所来贺寿之人不少,“各客纷来,皆相见一揖”,地方官员和军营武将“或一请安,均不行礼”,朋友、幕僚和部属祝寿,都是表示一下祝贺之意,并非隆重之“拜寿”。而后,曾国藩请大家在住所吃寿面,一共办了22桌,可见祝寿之人不少。吃完寿面,曾国藩宣布散场,他料理公事后,又坐船巡阅吴淞江,公接见六次。晚上写信一封,翻阅《中外古今年表》,“二更五点睡”,夜里10点多钟睡觉——这就是曾国藩60岁整寿的一天,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生日用席费五十四元(银元),应还冯卓如。”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

月初五是李鸿章的50岁生日,这时的李鸿章为一等伯爵、直隶总督,声势如日中天。为办好李总督的寿宴,成立了由直隶布政使领衔、十多位官员参加的协调班子。提前两天,天津的江安会馆就布置一新,司厨什役难计其数。

生日前一天,直隶总督署内“烛爆如山,繖绣成林”,奢华喜庆,下属和部将们轮流向李鸿章祝寿。江安会馆开幕招待祝寿的“司道诸将及候补各员”,吃大餐听大戏,“堂下戏台前设十六席,堂上二十一席,左右厢各四席”,主人和客人达260人,加上随从人等,“厥数倍之”,少算一些也有500多人。每张餐桌有服务人员2名,合计一下,餐桌服务员应为90名左右,同时“庖人托盘器幢幢往来者亦数十人,梨园子弟百人”,此外,会馆外还有警卫兵勇。据记载,这一天江安会馆内外人数不少于1000人,喝酒、听戏之后,又舞灯,现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目睹此景,参加宴席的官员赵烈文感叹:“繁盛至此极矣!”(摘自《扬子晚报》李晓巧/文)

乾隆南巡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按清史学家张勉治的详细估算,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总开支为1890万两白银,每次平均约为315万两白银,而清廷财政收入每年从3250万到6000万两白银不等,因此南巡开支相当于清廷每年财政收入的5%到10%。究竟乾隆南巡对国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南巡是不是导致乾隆朝由盛向衰转折的重要原因?

皇帝手头也会拮据

乾隆皇帝的小金库是内务府,那么,这个小金库里到底有多少钱呢?

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到乾隆六十年(1795),内务府收入总额为6880余万两白银,可以推测乾隆朝六十年的内务府总收入约8200万两白银。此外,户部每年会拨给内务府60万两白银,六十年合计3600万两白银。两项相加,内务府每年的收入在200万两左右。

看似内务府比较富裕,然而内务府有供应皇室消费的职责,实际并不富裕。乾隆三十年以前,皇室支出规模为每年100万到150万两白银,乾隆三十年以后为大约200万两白银。这些常用支出项目包括:每月采办皇室所用食品,赏赐,出巡、祭祀,修缮等。然而,内务府银库有盈余,还要返拨给户部,有时候会有百万余两白银。有时候,皇帝手

也会拮据。

盛世国力最大的挑战

要估算乾隆南巡对于乾隆朝国力的影响,仅算其在内务府收入中占的比例是不合理的;况且内务府有时候也并无余额,有些有余额的年份也会拨交给户部。因此,要看其在整个户部占的比例。

单从数据本身来看,南巡并非造成乾隆时代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乾隆时期,皇帝炫耀的十全武功才是最为庞大的支出,仅第二次金川之役就耗费6270万两白银,而大小战役相加起来造成了上亿两白银的支出。军事上的冒进和扩张,才是对于盛世国力最大的挑战。

再来看下乾隆皇帝的开销,开支最大宗的并非皇帝的巡游,而是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等。尤其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皇帝更多掏私人荷包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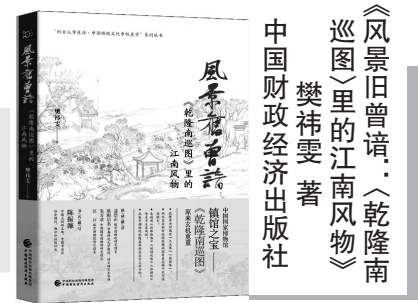
巩固民族关系,在蒙汉交界驻军边防沿线修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亦在北京、热河、五台山等地修建仿西藏建筑,称为藏传佛教中心。这些举措似乎对大清帝国稳定版图、巩固疆域、加强中央集权都有积极作用,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财政的流失。

再来看乾隆南巡,对大清来说,从经济角度来看没有动摇帝国的根本,并且还有政治方面的积极意义,其对维护清朝社会稳定、促进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南巡的“副产品”

但仅从这一角度评价乾隆南巡对国家的影响是不全面的。乾隆南巡亦有其负面影响。

首先,南巡是乾隆皇帝众多巡幸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路线最长、耗时最长的,其巡幸费用虽在国库银两中占比不高,然而,劳民伤财在所难免。乾隆一行在巡幸中



的生活标准几乎与宫中无异,不仅需要准备众多运输工具和人力,所经之处,要修建修葺尖营、行营、行宫、道路、桥梁等,还要设幔让民众回避,沿途要摆供迎接,花费自然不小。

再有,乾隆皇帝在南巡中讲究排场、追求舒适,因此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滋长了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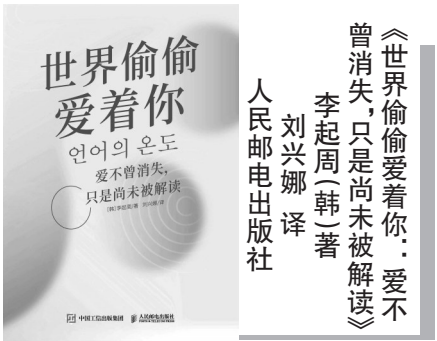
另外,乾隆皇帝雅好南味,亦流连于南方园林,因此有南园北移的设想,兴建皇家园林,此可谓南巡的“副产品”。

乾隆皇帝也时常反思自己的南巡之举,在退位后身为太上皇时,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不以对联。”看来其已经意识到南巡的负面影响,因此,乾隆之后再无南巡。

宰予是孔门高足,但他最大的名气源于挨老师批评。所谓铸颜雕宰,这个“宰”就是好学生颜回的对立面差生宰予。

《论语》里记载了他挨骂的原因:“昼寝。”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予与何诛!”孔子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宰予从此成了孔差生的典型。而他的差生的人设符合一般人对差生的刻板印象,昼寝,大白天睡觉嘛。假日里催女儿起床时,我多次举过这个反面例子。

前几天看到一篇论文,颠覆了我的认识。作者提出“昼寝”有误,“昼”应为“画”,两个字长得很像,古人抄写时搞错了,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一字之差,意思大变。昼寝之寝,意为睡觉,是动词,画寝之寝,则是寝室,是名词。画寝,大概就是豪华装修。那个年代,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都有严格的礼教。“诸侯画寝,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垩。”宰予没有官爵,家里四白落地就行,



绝对不能把屋子弄得雕梁画栋。用现在的话说,太高调啦。

画家黄宾虹的解释是,宰予的房子太破旧,孔子认为没必要在墙上作画。按此,孔子的批评是从设计和美学的角度出发的,联系“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圻”来看,也说得通。不过,孔子最讲究礼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制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学生做出格的事。在孔子的心中,豪华装修的罪过比大白天睡觉可严重多了。宰予“画寝”应该是他被老师批评的真正理由。

《论语》里还记了一条,宰予认为守丧三年,过于长久,对生活影响太大,孔子直接骂他“不仁”,说他没良心,忘了父母生下他后抱养三年的恩德。其实这孔子有点偷换概念,父母子女的伦理不应该变成储蓄式的存取或以养易养的交流。不过,也能看出宰予这家伙是个“刺头”,爱和老师唱反调,怪不得常挨批评。

(摘自《意林》胡一峰/文)

触动心弦的爱

有个词叫作“左右逢源”,指的是仔细地揣度周围的事物与现象,都能找到其根源,也可以解释为日常的一切事物都是学习的源泉。

不久前,在首尔坐5号线地铁途经孔德站时,一个微不足道的场面,触动了我心弦。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车厢里像下饺子一样挤满了人,我勉强地把自己塞了进去。

我抱着一丝希望环顾四周,没有空位,周围的乘客多半在埋头看着什么,其他人或是打电话,或是跟同伴说说笑笑。不经意间,我瞥见一对坐在老年人专座上的老夫妇,满头鹤发的老爷爷坐在老奶奶身旁,用手机听着新闻播报,边听边情不自禁地应和,“嗨”“哎呀呀”,有些聒噪。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播报声与老人充满激情的应和声此起彼伏,瞬间霸占了整个车厢。

坐在一旁的老奶奶把手放在老爷爷的手背上,轻声细语地说:“老伴儿,这么多人呢,咱们戴上耳机听吧。”